

高等院校选用教材系列

经济·环境·法律

李光玉 宋子良 主 编
韦 革 张小玲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X22-43

L31

经济·环境·法律

李光玉 宋子良 主 编
韦 革 张小玲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从五个侧面即科学技术、经济、环境、人口和法律,阐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经济部分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然后从实践层面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措施进行了论述。环境部分描述了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着重指出人类要彻底战胜生态危机,最根本的在于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建立起新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部分阐述法律对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专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有志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学习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环境·法律/李光玉,宋子良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5

ISBN 7-03-008241-9

I. 经… II. ①李…②宋… III. 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P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615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丽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2000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4

印数:1~10 000 字数:323 000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北燕〉)

前 言

过去,在谈到“可持续发展”时,常常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经常提到的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出现了空洞,全球气温上升,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土地的沙漠化等,就是这种可持续发展观的反映。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经济·环境·法律》一书,也是谈可持续发展的,但显然其着眼点已从环境方面大大外推了,推广到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社会在内。一句话,本书是谈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又回到了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Lester R. Brown的观点上来了,因为在那一年,他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一书。

《经济·环境·法律》一书共分9章,前3章是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五两章是谈环境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第六章谈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七章谈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看出,这是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选择重要的四个方面,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加以具体阐述的。但如何保证这四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呢?这就要靠法律。所以在第八、九两章专门谈了法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书的最初思路是华中理工大学原副校长、现广东佛山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秦忆教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大学生素质教育中注重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題,体现大学课程体系现代性与现实性的特点。这种想法立即得到了华中理工大学教务处的响应,并在范华汉、刘太林两位处长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写作班子。书稿的大纲是在秦忆校长的直接参与下确定的,初稿写出后,秦忆校长又亲自听汇报,作指示,严格进行质量把关。因此,没有秦忆校长和范华汉、刘太林处长的大力支持,就没有这本著作的问世,在此,本书的作者对他们深邃的教育思想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 者

绪论 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

一、生态危机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

茫茫宇宙,遥遥河汉。在大约 47 亿年前,地球——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家园诞生了。物转星移,沧海桑田,在大约 200~300 万年前,千种民性、万般风情的人类终于在这蓝色的星球上开始由古猿进化而来。

人类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界的对立物,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依赖自然,又作用自然。人类和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既维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又影响着自然界的演化与面貌。在历史洪流的不同阶段,人类在其家园的山川与田野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远古洪荒之时,原始人信奉自然崇拜,任何自然物都可以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它反映出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初步认识。人类就像天真的孩童一样仰望苍天,俯视大地,那深邃无限的宇宙、纷繁灿烂的星辰、江河肆虐的大地及神秘莫测的生死死死,都是不可捉摸的对象。所以,蒙昧时代的人类崇拜自然,畏惧自然,在雷、雨、风、水、电等自然之物面前俯首贴耳,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乞求恩赐。显然,此时的自然完全是人类的主宰者,人对于自然界而言,只不过是千姿百态的物种中的一群小精灵而已。人类只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①

在历经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后,人类终于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61 页。

状态,进入了农业文明的门槛。建立在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然观,已经逐渐摆脱神话、幻想式的观念,人们开始摒弃仰天、崇天等消极无为的认识,推崇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和力量。在古希腊,人们把敢于违抗天庭的普罗米修斯视为英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甚至响亮地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在中国,人们把教民耕作的神农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劈山治水的大禹奉为神祇,思想家荀况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东西方人的这种人定胜天的观念,虽然还不是近代人们所说的人征服自然的命题,但这种把人放在自然之上的观点,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先河。

在“人定胜天”口号的鼓舞下,人类高唱耕作与畜牧两支战歌,战天斗地,垦土地,拓牧场,向自然争得了一定的自由。然而人和自然的矛盾也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加节制地肆意向大自然动武,必然会引起大自然的震怒。在五谷丰登、遍地牛羊的背后,森林匿踪,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沙流尘扬。例如,古代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无情地放倒大片森林,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公元前,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拉斯河流域,曾经是千里沃野,林木葱郁,但过度的向大自然开战和连年兵戎征战造成了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最后导致山穷水恶、人烟绝迹的荒凉境地,可怜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墓地都掩埋在滚滚黄沙之下。早在 4000 年前,印度的塔尔地区也曾是良田万顷,农夫如织,孕育了令世人称羨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如今却是风沙蔽日的塔尔沙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黄河流域的森林木也曾养育过灿烂的华夏文明,如今,黄土高原却坦露着瘦骨嶙峋的脊梁,沟壑里的泪水承载着世界河流泥沙最重的身躯和“黄河清”的梦幻,一路呜咽一路寻。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演化史的新篇章。工业革命最大的奇迹就在于,它改变了农业时代对劳动力的绝对依赖,使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人类自身的力量,

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光芒,人的智慧之光以令人眩晕的场景展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在工业革命的凯歌声中,雷鸣般的机器声被当作人类战胜自然界的进行曲,似乎自然界只能在大工业的威力下唯唯诺诺,任人摆布;人类是英雄,自然界是战俘和奴隶。为了显示人的尊严和力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曾在否定上帝的同时,慷慨地赋予人类以无限性。在他们看来,人的无限性当以人的理性的无限性为核心,个人诚然有限,但人类无限,人类双手的力量固然有限,但知识的力量无限。为此,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在一些思想家们看来,人类可以借助知识的力量、理性的光芒认识自然规律,更可依据所得到的真理性认识在实践中改造自然、驾驭自然,从而迫使自然界屈服于人类,为人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们是自然界的主人”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界索取”,这是俄国科学家米丘林震撼寰宇的名言;法国科学家彭加勒也曾高傲地宣称:“今天,我们不再乞求自然,我们支配自然”。^①

诚然,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工业文明使人类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不断地战天斗地,改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状态,改变了人类从属于自然、依赖自然的地位,并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创造了过去人类几千年难以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②斯人已逝,余音袅袅!先觉们对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沉思与忧虑已经酿成了现实的喧响;当人类为自己的伟大成就欢呼雀跃时,以三大危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危机正在无情地讨伐人类。

——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以一种威胁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生态危机形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自工业文明以来直到现在人类征服自然活动的非理性扩张和膨胀的恶果。人类社会的生存与

^① 《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发展是建构在生态环境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支撑和限制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也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和破坏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的降临:到处是林立的烟囱和浓密的黑烟,浑浊的河流,遍地的工业废物,失去生机的大地和森林。农业文明时代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已不再有,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审美情趣也逐渐远去,人类从此仿佛是踏上了一条远离养育自己的大地——自然母亲的不归路。近 30 年来,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酸雨成为“空中死神”,有毒化学品进入环境循环等。就其毁灭人类和自然界的可能性来说,环境污染仅次于核浩劫。

——资源危机。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强调到任何地步都不是夸张,正是资源决定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范围和方向,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性质与变迁。从产业革命以来 200 多年的时间中,人类一直是在不受阻碍、不加节制地以掠夺性的方式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加快,从而也导致了资源耗竭危机的出现和加剧。发展到现在,尤其是最近 50 年中,整个世界无论从生产和消费都已经大大增加,以至几乎全部重要资源的储量正在被大量地消耗着,导致自然资源尤其是某些矿产资源的消费量几乎是成倍地增长。在可再生资源方面,森林资源尤其是热带雨林的破坏十分严重。耕地是另一种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世界上现有耕地面积为 13.7 亿公顷,约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10.5%,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世界每年要损失 500~700 万公顷的耕地,在耕地危机中,良田变荒漠对人类威胁最大。相关研究表明,土壤的沙化正在威胁着世界上约 9 亿的人口,而全球 35% 以上面积的土地正处在沙漠形成的直接威胁之下。淡水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的命脉。从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耗水量最

为巨大的新兴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全球正面临着一场淡水资源的深刻危机^①。

——能源危机。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化得以创造和延续的基础。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能源的危机就像可怕的梦魇一样伴随着人类,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一次次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所说的能源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石油危机。据哥伦比亚科学家埃米尔·贝诺瓦推论,如果全球能源消费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现存的能源储备在 25 年内将被消耗殆尽,这实际上就表明,全球石油告罄的时间大约在 25 年左右。从 70 年代两次震撼世界的能源危机之后,当代人类建构在以石油为主导的能源结构基础上的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理想,便随之崩溃。尽管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成功地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能源危机的障碍,昂首阔步地从一个能源时代走到了另一个能源时代,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延续了人类文明的继续生存和不断发展,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人类能否最终跨越能源危机的陷井而获得继续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将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迫近,直接地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冲突境地,与此同时,也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起了放大的作用。从更深层次意义上看,它对人类活动方式与活动目标提出了严重挑战。如果既不认真正视又不切实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更谈不上人类发展的光明前景了。

二、解铃还须系铃人 ——克服危机的理性选择

面对全球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人类并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

^① 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0 页。

自己的反思与警醒:实现人类自身可持续性的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战略和行动是重建人类自然家园的唯一选择。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持续性的观念和意识早在 2000 多年前就进入了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方式之中,但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则诞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叶以后。这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如何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如何由不发达向发达过渡,以及这种过渡的条件、途径。战后,殖民帝国主义已走向崩溃,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振兴自己的国家;消除和摆脱贫困落后,自然就成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各种各样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思想和战略,例如,“赶超发展战略”、“起飞发展战略”等相继问世。在整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各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增长热”,不但各种书刊、报纸、杂志以及其它传媒中都充斥着大量鼓吹经济增长的言论,甚至各政党的竞选宣言中也少不了加速经济增长的承诺。

这种发展观的基本信念是“工业文明论”,即以工业的“增长”作为救国良方和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 GNP(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目标的狂热追求。以经济增长来涵盖发展问题。在这一时期,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是发展政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成为测度发展的唯一目标。客观地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确实有所增长,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的弊端。人们终于大彻大悟:经济的增长不能代表社会的、科技的、政治的、生态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科技、环境与社会全面的、综合及协调的发展过程。在随着世界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资源的消费与废弃物的排放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的征兆日益加剧的态势下,人们才开始认真地把

经济、环境、资源等当作一个密不可分的复合系统来看待。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明确地将有机体与它们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1949年,美国学者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一书中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关系,强调人类要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为争取明天的生存而斗争。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问世,该书描述了由于杀虫剂污染造成的一个没有鸟叫的死气沉沉的春天景象,唤醒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则真正敲响了人类的全球环境危机的警钟。

为了克服日益逼进的生存危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便呼之欲出,并很快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认同。

《只有一个地球》

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当代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构成了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块基石。《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对人类现代活动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并告诫世人:“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人类对生态的错误行动。……我们把征服自然看作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因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他的尊严吗?”正因为如此,该报告明确提出了要重建“地球上的秩序”。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意义深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拉开了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具体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和实践的序幕。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经典性的界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①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②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

人力资源;③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年限,不断开辟新的和可更新能源;④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⑤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⑥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由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的新思想,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经济行为认识的飞跃。

《北京宣言》

1991年6月18日~19日,由中国发起在北京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并发表了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立场的《北京宣言》。《北京宣言》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全球环境迅速恶化的深切关注,并向世界作出了庄严的承诺:“我们确认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出于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强烈关注,发展中国家将“全力以赴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努力”。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等原因,富有国与贫穷国之间的鸿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逾越,《北京宣言》也要求,发达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应该率先垂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建立一个有助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和持久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里约宣言》及《21世纪议程》

1992年6月3日~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签署了一系列有助于保护地球家园的国际公约。这一史无前例的会议使得人类克服生态危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行动自提出以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了从生态、经济、社会乃至伦理等方面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27项基本原则,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庄严宣告和确立了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行动的地位。《21 世纪议程》是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它涉及到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从现在到 21 世纪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的行动蓝图。其基本思想是：人类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抉择关头。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现行政策，势必难以消除国家间的经济鸿沟，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将会更加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观念和政策，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可持续的未来。

以上思想及行动充分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解决目前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乃是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人类必须在自身的生存观念和发展观念中进行一场深刻转变，把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等诸要素整合到一个新的目标框架之中，以寻求和建立一种以保护人类的家园、实现人类自身可持续性的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战略行动。

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图在政策与法规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等方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法规方面看，不少国家一方面成立环境保护机构，另一方面加紧进行环境保护立法，把对环境保护与管理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其立法的范围，由一个国家的地区立法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立法，立法的内容从防止工业污染发展成为全面的环境保护。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例如，前苏联于 1960 年颁布了《自然保护法》；日本继 1967 年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后，又颁布了 200 余件环境保护法规；美国在 1969 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后，也颁布了 120 多种环境保护法规；我国也于 1978 年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正式写入宪法，并于 198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为了解决世界性公害问题，调整国际环境保护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国际环境法应运而生。同时，保护环境的国家机构也相继成立，至今已有 100 多个，以加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合作。近 10 年来，保护人类环境的思想、原则、方针越来越多地载入联合国

的决议和宣言。如 1992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除通过了包含有详细的行动计划,目标和方案的《21 世纪议程》外,还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条约》、《森林保护问题的原则声明》等。

在行动计划方面,国际上也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第一,开始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直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经济活动的成果进行评价。第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系统,努力促进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的消费向减少环境负荷的方面转变。如世界标准化组织建立了 ISO14000 标准体系,这一体系要求企业设立自身的环境政策和目标,控制其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第三,各有关国际组织和开发援助机构都把环境保护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作为其提供开发援助计划的重点领域,具体包括扶贫、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制度建设等。第四,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实践,控制污染物排放。如近年来欧美国兴起的生态工业园,就是实现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得益彰的双赢模式。

三、请与人类同行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与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原则与实践是人类认识自身与自然关系,对自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泥泞征程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克服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的经济、环境和生态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无疑使人类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重建和谐美满的自然家园的历程上,获得了一个正确的行动目标和纲领。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与自然界,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服从自然规

律。与此同时,自然既是人类生活的环境,又是实践活动的对象。因此,一方面人类应抛弃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克制人类疯狂膨胀的物质欲望,抛弃片面追求急功近利的狭隘思想,否定不顾后果与不负责任的生存态度,改变疯狂掠夺与肆意盘剥自然的放纵性活动,合理地、适度地、有节制地改造自然,努力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思想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根基、家园与母体,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某一方面的发展都不能称之为可持续发展;人类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必须对人类自身行为和生态环境进行双向控制,既要控制自身的实践活动,又要控制生态环境,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与自然资源的承受力,自觉预见人类行为所产生的或远或近的自然影响。因为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们所具有的生态承载能力,对污染的净化能力以及对生物物种的调节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越了这些限制就势必受到自然的反馈报复,从而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当人类自身行为不超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再生能力与净化能力,即人能合理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共同进化、协同发展。实践证明,人与自然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人违背自然规律或人在自然面前表现得为所欲为时,这个矛盾整体就表现出它的发散性,其发展变得尤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当人顺应自然规律或者人能够合理、适度、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时,这个矛盾共同体就表现出它的收敛性,其发展将是迅速且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发展,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经济增长与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依存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变量。当它发生某种变化时,生态系

统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失衡,产生危机。在现代社会,物质革命狂奔式的发展与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生态效益的流失。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承认环境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和服务价值,承认环境对生命和社会系统的存在价值,它要求把社会生产中环境资源的投入和服务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它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系统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和程度的客观标准。因此,一流的环境保护就是一流的经济发展,一流的环境政策就是一流的经济政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生态危机的形成与生态效益的恶化无疑应承担主要责任;面对今天的危机,应当通过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通过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遏制其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的破坏。从目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不发达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压力来看,经济不发达导致贫困,而贫困又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又更加剧了贫困。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其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等物质基础,才能摆脱贫困,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战略,增长经济的同时,也应当保持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性,切不可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自身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和谐共处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活动终究是为了实现一定利益,这种利益构成了活动目标的实在内容。在历史上,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一特殊时期确实存在过,但在更多的时期是人类成员对自身局部利益的盲目追逐。人类成员对自身局部利益的突现与强化,往往既不顾及其它局部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又不考虑人类整体利益的承受力与许可度。几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了自身最大利益,不择手段地掠夺弱小国家的资源与

财富,甚至置全人类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人类活动在价值目标上的极度倾斜,即自身的局部利益的无限膨胀,造成人类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对抗和复杂多样的冲突,从而使人类社会不断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但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当代得到了明显的突现,全人类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根本利益获得了独立性,这一共同利益既不是阶段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绝对对立面,也不是它们的简单附属物。为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尤其强调,生态危机已把全人类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自然界的行动是没有国界的,西伯利亚寒流会支配日本的冬天;赤道下的太平洋所产生的大风会经历数千公里的旅程来袭击日本;墨西哥的海湾在左右着欧洲的气候;美国的农作物如果歉收,全世界的粮食都会发生困难。地球是一个整体,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①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消除人类群体间的对抗,必须树立人类利益观念,承认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与人类文化的可通性,尊重各国人民都应享有的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力,应当承认惊世危机对全人类的巨大威胁,确立全球合作与协同行动是对自身利益与人类利益共同维护的紧迫要求。当然,树立人类利益观念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要放弃对危及人类命运的资本主义侵略意识与剥削本性的批判与揭露。

根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原则一: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原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它要求当前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当代人的福利水平,反对那种认为必须停止经济发展以保护环境的观点。第二,它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具有长远观点,充分保证代际间的公平,不以牺牲

^① [日]地田大作等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